

# 试论云南地区打制双肩石器

陈 娜 (昆明市博物馆)

**摘要：**云南西部的三江流域分布着一种独特的打制双肩石器，流行年代与云南青铜文化相当。该类石器，有可能脱胎于云南西部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并对云南青铜文化中的某些青铜器造型产生了影响。

**关键词：**云南；打制双肩石器；年代；磨制石器；青铜器

**中图分类号：**K87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10)01-0031-08

双肩石器，顾名思义即是有两个肩部的石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王仁湘和傅宪国两位先生分别认为：“两侧都有对称肩的石器通称为双肩石器”<sup>[1]</sup>；“有肩石器，或称双肩石器，其共同特征是器形宽扁，上部有双肩，以肩为界，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装柄部分，下部为刃身”<sup>[2]</sup>。打制双肩石器，即打制的双肩石器。制作特点是用砾石直接打下石片，再于石片两侧敲击出缺口而成。多数石器一面都保持原来的砾石面，另一面为破裂面。

本文主要以公开发表的资料为基础，对分布在云南怒江、澜沧江流域中上游以及龙川江地区的打制双肩石器及其相关问题做一初步探讨。

## 一、打制双肩石器的分类

打制双肩石器在云南怒江上游的福贡<sup>[3]</sup>，中游的保山<sup>[4]</sup>、龙陵<sup>[5]</sup>、施甸<sup>[6]</sup>、云县<sup>[7]</sup>、昌宁<sup>[8]</sup>，澜沧江下游的景东<sup>[9]</sup>、镇源<sup>[10]</sup>、景谷<sup>[11]</sup>、临沧<sup>[12]</sup>、思茅<sup>[13]</sup>、澜沧<sup>[14]</sup>等地（图一）有发现。遗址所在地多是河流的一级或是二级台地上。笔者主要依据石器的刃部特征分类如下：

**A 型** 石器整体形似梯形，刃部、肩部不太明显。在龙陵船口坝<sup>[15]</sup>、云县忙怀、景谷大块田等地发现。（图二，1）

**B 型** 石器刃部较 A 型明显，刃部约呈椭圆形，刃长度比宽度大，肩部较为对称，但是因手

工制作的随意性，并非绝对对称。分为三式：

**B 式 溜肩。**在云南云县曼干发现。（图二，2）

**B 式 肩部较 B 式明显。**在云县曼干、云县忙怀、景东丙况、思茅象鼻山发现。（图二，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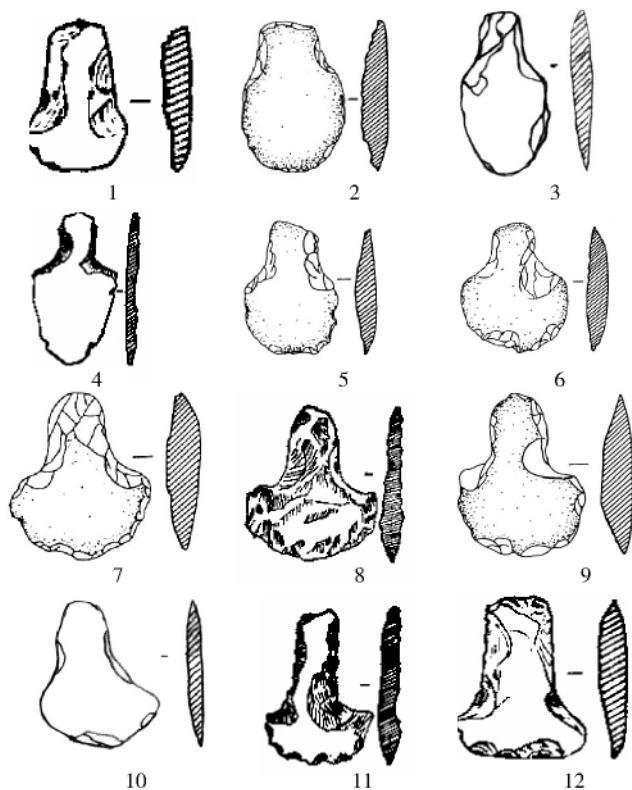
**B 式 肩部折角接近 90 度。**在龙陵大花石、龙陵船口坝发现。（图二，4）

**C 型 刃部较 A 型明显，分为两式。**

**C 式 刃部约呈圆形，刃长度和宽度接近，**



图一 云南打制双肩石器分布图



图二 打制双肩石器的分类

1. A型(龙陵船口坝); 2. B式(云县曼干); 3. B式(景东丙况); 4. B式(龙陵船口坝); 5. C式(云县曼干); 6. C式(云县曼干); 7. C式(云县曼干); 8. C式(龙陵船口坝); 9. D式(云县曼干); 10. D式(景东丙况); 11. D式(龙陵大花石); 12. E型(龙陵船口坝)

肩部较为对称,但是因手工制作的随意性,并非绝对对称。在云县曼干、景东丙况、昌宁德斯里、福贡、保山市瓦渡乡旧田等地<sup>[16]</sup>、临沧老邦东、临沧那蚌发现。(图二,5)

C式 刃部约呈扁圆形,根据刃部的变化分为三式:

C式 刃长度稍小于宽度。在云县曼干、施甸半坡牛汪塘、保山市大田坝等地<sup>[17]</sup>发现。(图二,6)

C式 刃长度小于宽度。在云县曼干、昌宁德斯里、临沧昔归发现。(图二,7)

C式 刃部约呈月牙形。在龙陵船口坝、临沧老邦东发现。(图二,8)

D型 刃部不规则,肩部不对称。根据肩部的变化分为三式:

D式 肩部不对称情况不太明显。在云县曼干、昌宁德斯里发现。(图二,9)

D式 肩部不对称情况较明显。在云县忙

怀、施甸半坡牛汪塘、龙陵船口坝、昌宁德斯里、镇源秀山、景谷大块田等地、景东丙况、景东棠梨箐等地<sup>[18]</sup>发现。(图二,10)

D式 肩部不对称情况明显,刃部约呈靴形。在龙陵大花石、船口坝发现。(图二,11)

E型 整体似帚形,刃部宽窄,柄部宽粗。在龙陵船口坝、昌宁德斯里发现。(图二,12)

## 二、打制双肩石器的年代分析

云南发现的打制双肩石器的地点多为采集点,正式发掘的较少,并且这类遗址地层包含物不多,陶片尤其稀少。这给年代的判定带来了不少困难。目前为止,经过正式发掘(包括试掘)的遗址有:云县忙怀遗址<sup>[19]</sup>、龙陵大花石遗址<sup>[20]</sup>、景东丙况遗址<sup>[21]</sup>、云县曼干遗址<sup>[22]</sup>等。现已知龙陵大花石有年代测定。龙陵大花石遗址据发掘者称,该遗址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地层包括第 层和第 层,所出石器以磨制为主,第 层、第 层的热释光年代测定数据分别是距今  $3532 \pm 170$  年与  $4017 \pm 90$  年<sup>[23]</sup>;晚期地层出土了大量打制双肩石器、刮削器等,并于晚期地层中还发现了石范和铜屑,这证明龙陵大花石遗址晚期地层年代下限已至青铜时代,晚期地层年代经热释光测定为距今  $3335 \pm 160$  年<sup>[24]</sup>。除龙陵大花石遗址发现有铜器外,还有景东丙况遗址也发现铜片。景东丙况遗址的 、 、 层为晚期地层,石器多出在第 和 层,铜片出在第 层。该遗址还出土了少量的陶片,出土陶片的陶质和主要纹饰与龙陵大花石遗址的陶片近似。景东丙况遗址的双肩石器与龙陵大花石遗址的双肩石器在形态上非常接近,另外,龙陵大花石遗址晚期地层的一种条形的打制石斧在景东丙况遗址也有发现。两个遗址文化面貌比较接近,因此景东丙况遗址的年代可能也接近于龙陵大花石遗址晚期地层年代。云县忙怀遗址因为是试掘,所以遗址面貌不是很清晰,但是从试掘出土的双肩石器与条形打制石斧来看,其形制与景东丙况遗址情况较一致,出土的陶片的陶质、纹饰、可辨器型均与龙陵大花石、景东丙况遗址有一定的相似性,而且忙怀遗址地理位置上与景东丙况遗址靠近,因此,云县忙怀遗址的年代也可能与龙陵大花石遗址晚期地层年代相当。云县曼干遗址也是

为数不多的经过正式发掘的遗址之一，共出土了10件陶器，陶质、器型与龙陵大花石、忙怀遗址的相似。该遗址的打制双肩石器肩部不对称情况不太明显，即只有D式发现，D式以及D式都未见，似乎发展还处于较早时期，因此推测年代应该稍早于龙陵大花石、景东丙况与忙怀遗址。

云南另外比较重要的打制双肩石器采集点有龙陵船口坝<sup>[25]</sup>、昌宁德斯里<sup>[26]</sup>、施甸半坡牛汪塘<sup>[27]</sup>、景谷边疆乡<sup>[28]</sup>。龙陵船口坝采集点与大花石遗址相去不远，同在怒江西岸，龙陵船口坝采集到较多数量的陶片和打制双肩石器，形制上与大花石遗址非常相似，两地点的年代应该接近。施甸半坡牛汪塘采集点位于施甸县境内枯柯河西岸，在该处采集到了数量较多的打制双肩石器，形制与龙陵船口坝、大花石、景东丙况遗址皆相似；另外，在该处还发现了数量较多的打制条形石斧，形制上与忙怀遗址、景东丙况的同类石器较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在该处还采集到较多数量的陶片，质地坚硬、火候较高，与上述各遗址出土陶片情况不同。不过因施甸与龙陵接壤，因此施甸半坡牛汪塘遗址年代与龙陵大花石遗址的也可能相去不远。在昌宁德斯里采集到了较多的打制双肩石器，发现的共存物较少，石器形制上与上述各遗址类似，年代上也可能差不多。景谷边疆乡发现的打制双肩石器打、磨兼制，双肩不明显，仅在刃部作不对称形。这一特点与思茅地区其他打制双肩石器的采集点采集到的打制双肩石器的情况一致。思茅地区在镇源、景东、景谷等许多地方还发现了打制双肩石器，但是这些石器有的虽然似不对称双肩石器，但是肩部已经不再明显，并且有的是打、磨兼制。综合看来，这些地点发现的打制双肩石器不具备龙陵大花石、景东丙况等遗址典型打制双肩石器的特点，年代上应该不会早于龙陵大花石、景东丙况等遗址。在以上所述遗址中，龙陵大花石、景东丙况两个遗址已发现铜器残片，此外，龙陵的安庆村、水井洼<sup>[29]</sup>等地的“忙怀”型双肩石器与形制类似于“忙怀”型双肩石器的双肩红铜斧共出同一层位、在思茅（现普洱）地区的澜沧县发现有与双肩石斧相似的铸造铜斧的石范<sup>[30]</sup>，因此，综合看来，打制双肩石器的出现年代较

晚。由于云南地处西南，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在中原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的同时期，云南仍然还在大量使用石器，处于一个相对比较长久的铜石并用时代。已知云南青铜时代遗址最早的是剑川海门口，其年代是距今 $3115 \pm 90$ 年，树轮校正是公元前 $1335 \pm 155$ 年<sup>[31]</sup>。因此，推测打制双肩石器至少在商周时期即已流行，其上限可能至云南新石器晚期，并且有可能一直延续至西汉早期云南铁器出现之前。

### 三、打制双肩石器的起源

在云南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分布着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该类型以龙陵大花石遗址早期文化为代表，具体分布在云南西部的昌宁、施甸、保山、腾冲、龙陵、潞西、瑞丽、陇川、盈江、梁河等县（市），处于怒江下游和伊洛瓦底江支流龙川江—瑞丽江和大盈江流域，以保山市和施甸、龙陵、昌宁县境内分布较为密集<sup>[32]</sup>。这一文化类型的遗址与发现打制双肩石器的遗址在云南的南部地区有少量交叉分布，经过发掘或试掘的有龙陵大花石、昌宁达丙营盘山<sup>[33]</sup>、施甸由旺狮子山<sup>[34]</sup>、保山金鸡将台寺<sup>[35]</sup>等遗址。该类遗存特征是：石器以磨制的斧、锛、石刀为主要器型，其中又以一种磨制甚精的梯形小石锛（斧）为特色。这种小型石锛（斧），高4~6厘米，刃宽度相比高度略小些，厚1厘米左右。该类型遗址出土一种刻刀形器，在云南其他的新石器文化类型中未发现。陶器质地主要是夹砂陶，泥质陶极少，有红、灰、黑、黑褐等。陶器器型有敛口折沿罐、敛口钵、敞口折沿盆。陶器纹饰以划纹为主，分弦纹、斜平行纹、竖平行纹、水波纹等，斜、竖平行线通常是三条或四条一组。该文化类型的遗址目前已知只有昌宁达丙营盘山和龙陵大花石遗址有年代测定：昌宁达丙营盘山房屋遗迹所出碳化木柱的碳十四年代为距今 $3304 \pm 82$ 年（公元前 $1354 \pm 82$ 年），树轮校正为公元前1870年<sup>[36]</sup>。龙陵大花石遗址的早期包括该遗址的第层和第层，第层的热释光年代测定是距今 $3532 \pm 170$ 年，第层的热释光年代为距今 $4017 \pm 90$ 年<sup>[37]</sup>。云南西部该文化类型的年代上限可能距今4000左右，下限可能与云南青铜文化出现年代相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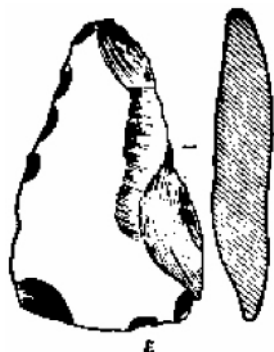
值得关注的是,在云南的西北部还有几个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它们是永平新光遗址<sup>[38]</sup>、宾川白羊村遗址<sup>[39]</sup>、永仁菜园子<sup>[40]</sup>、磨盘地遗址<sup>[41]</sup>、元谋大墩子遗址。这几个遗址之间陶器形制差别较大,但是这几个遗址之间,石器形态却相当接近,而且它们出土的磨制石斧与石锛,与龙陵大花石遗址早期地层的石器形态较接近。永平新光遗址出土的磨制小型石锛与龙陵大花石遗址早期地层出土的小型石锛相似性尤其大。永平新光的年代是距今约4000—3700年<sup>[42]</sup>;宾川白羊村的年代一个取自早期第9号房址2号柱洞出的木炭年代测定,为距今 $3770 \pm 85$ 年(公元前1820年),树轮校正为公元前2190—1930年,一个取自T7的炭化木柱为距今 $3675 \pm 85$ 年(公元前1725年),树轮校正为公元前2036—1779年<sup>[43]</sup>;永仁菜园子遗址80年代试掘过,2001年时又经发掘,80年代发掘的碳十四年代数据为距今 $3910 \pm 80$ 年,树轮校正为公元前2453—2137年<sup>[44]</sup>;磨盘地遗址的年代为距今3400年<sup>[45]</sup>;元谋大墩子的年代数据取自该遗址早期第5号房基第12号柱洞出土的木柱,碳十四年代测定为距今 $3210 \pm 90$ 年(公元前1260 $\pm$ 90年),树轮校正为公元前1512—1309年<sup>[46]</sup>。可见,这几个遗址除元谋大墩子与磨盘地的年代较晚以外,其余皆与龙陵大花石遗址早期地层年代接近,同时这几个遗址在地理位置上并非相距很远,因此在石器文化方面他们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可能性,石器形态的相似性可以理解。

龙陵大花石遗址早晚两期石器面貌差异较明显,早期是以磨制石器为主,晚期是以打制石器为主,但是从出土的陶片来看,早晚两期在陶质、纹饰、可辨器型方面存在一定的联系。不但龙陵大花石遗址早晚两期如此,与龙陵大花石遗址晚期石器文化面貌近似的打制双肩石器遗址,如云县曼干、景东丙况、云县忙怀、龙陵船口坝等遗址,它们出土的陶片的质地、纹饰以及可辨器型,均与龙陵大花石遗址早期有一定相似性。这表明,龙陵大花石遗址早晚两期所代表的两种不同的石器文化类型,的确存在一定的关系。目前为止,景东丙况、云县忙怀、龙陵船口坝以及大花石遗址晚期都发现有数量比较多的打制条形石斧(图三、图四)。这种类型的石斧与大花石

遗址早期、宾川白羊村、永平新光、永仁菜园子、磨盘地以及元谋大墩子遗址中的磨制石斧、石锛形制相似。本文分类中的A型打制双肩石器属于大花石遗址晚期,类型上与大花石遗址晚期的打制条形石斧形制相近,同时也与宾川白羊村、永平新光遗址、永仁菜园子、磨盘地以及元谋大墩子遗址中的磨制石斧、石锛形制相似。因此,推测打制双肩石器可能最初即是由云南西部新石器时代的磨制石斧、石锛发展演变而来。



图三 龙陵大花石  
出土的打制条形石斧



图四 云县忙怀  
出土的打制条形石斧

#### 四、打制双肩石器与青铜器的关系

云南的青铜时代遗址目前发现最早的是剑川海门口遗址,该遗址在1957年<sup>[47]</sup>和1978年<sup>[48]</sup>共清理了两次:根据1957年清理的报告,该遗址出土了陶器、石器、角器、骨器、铜器、木器等,其中铜器共十四件;根据1978年发掘的地层表明,铜器均出于Ⅰ、Ⅱ层,第Ⅲ层被铁器时代人所扰乱,第Ⅳ层未被扰乱,铜器与石器、陶器、骨角器、木桩同出,所出一件铜钺仍砍于木桩的横梁上。两次发掘出土的木柱年代测定分别为:1957年的是距今 $3115 \pm 90$ 年,树轮校正为公元前1335 $\pm$ 155年;1978年的是距今 $2595 \pm 75$ 年,树轮校正为距今 $2660 \pm 125$ 年。可见海门口遗址年代大约相当于中原的商周。

海门口遗址铜器还不是最原始的青铜器,它们已在铜器时代的路上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路程<sup>[49]</sup>。那它们的源头在哪呢?

在云南,发现了青铜器与打制双肩石器共存的遗址,且有地层学上证据:龙陵大花石和景东丙况遗址与青铜器共出,龙陵的安庆村、水井洼<sup>[50]</sup>等地的“忙怀”型双肩石器与形制类似于

“忙怀”型双肩石器的双肩红铜斧共出同一层位。红铜不是青铜，但是一般却是青铜产生之前的铜器制作原料，青铜器制作是从采用红铜逐渐过渡到使用青铜为原料的。剑川海门口遗址也发现了采用红铜为原料的铜器，与双肩石器遗址出现的红铜器一样。因此，云南早期青铜文化可能与云南打制双肩石器有关系。

剑川海门口遗址1957年清理获得三件有肩铜器（原报告称作铜钺和铜斧）（附表，5、7、8），1978年发掘获得一件有肩铜器（原报告称作铜钺）（附表，6），其形制皆与云南西部忙怀、曼干、丙况、龙陵、昌宁、福贡等地打制双肩石器接近，具体来说与本文分类的A型、B式、C式、C<sub>1</sub>式形制上相近。这种相似性，不是偶然的：从年代上看，由于云南的打制双肩石器在龙陵大花石和景东丙况遗址发现与青铜器共出，因而其至少在云南的青铜时代即已出现，与剑川海门口时代相当；从地理位置上看，剑川与忙怀、曼干、丙况、施甸、昌宁、福贡等地所处皆属于云南西部怒江、澜沧江并流地带，位置上相互接近，存在相互影响的可能性；此外，剑川海门口铜器中还有一件实心梯形铜斧，该铜斧形制与云南西部磨制条形石斧类似，并且与打制双肩石器遗址中的打制条形石斧形制上也相似，剑川海门口的铜器并非只与一种石器有关系。因此，综合看来，剑川海门口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与云南西部石器联系较多，其有肩青铜斧、钺的形制极有可能是受云南西部打制双肩石器影响所致。

除剑川海门口遗址外，云南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青铜器与打制双肩石器形制上相似。

云南打制双肩石器中有种双肩石器即C式，在洱海区域的云南楚雄万家坝<sup>[51]</sup>、云龙布麻<sup>[52]</sup>和怒江中下游的施甸、澜沧江下游的景洪<sup>[53]</sup>以及滇池区域的江川李家山<sup>[54]</sup>、晋宁石寨山<sup>[55]</sup>、呈贡天子庙<sup>[56]</sup>等地都发现有相似类型的青铜器出现（原报告称为铜钺、铜斧）（附表，10）。年代上，楚雄万家坝、云龙布麻出土的不会早于春秋早期；施甸与景洪的情况不明，暂不做讨论；江川李家山、晋宁石寨山、呈贡天子庙等地年代约在战国至西汉时期。形制上，洱海区域的纹饰较简单，滇池区域的要相对复杂得多。

由此看来，滇池区域的铜钺要比洱海区域的出现得晚些，形制上滇池区域的与洱海区域的有着密切联系，似乎洱海区域的铜钺影响了滇池区域的出现与发展。这种情况可能也说明云南青铜文化中的某些因素是受到云南西部打制双肩石器的影响，由西至东逐渐发展变化而出现的。

另外，在云南打制双肩石器中还有D式双肩石器，在青铜器中也发现有与之形制接近者。从目前已公布的材料来看，云南元江<sup>[57]</sup>一个青铜时代墓地出土了此种形制的有肩铜器（原报告称作铜钺）（附表，12、13）。该墓地分为三期，分别出土铜钺A、B、C型。A型为刃部对称型，年代最早，原报告作者将时代定为春秋晚至战国中期；B型形制接近D式，年代与A型同；C型也接近于D式，年代稍晚，约为战国晚期。此三型铜钺中的B、C型很可能即是受云南西部打制双肩石器的影响而出现的。

此外，在云南打制双肩石器中还有类双肩石器即D<sub>1</sub>式，在青铜器中也有与之形制接近者。迄今为止，已在昌宁<sup>[58]</sup>（附表，17）与滇池区域的江川李家山、晋宁石寨山（附表，15、19）发现了类似青铜器（原报告称为靴形钺、铜钺）。昌宁与滇池区域的在形制上相比差异稍明显，具体在形制上昌宁出土的靴形钺与滇池区域的江川李家山、晋宁石寨山相比有如下特点：釜身无单耳或立体动物，形体较大，纹饰简单，以网纹、平行纹、圆圈纹为主，刃部发达且富于变化，刃两端一般不在同一水平线上。相反，滇池区域等地的靴形钺柄部都铸有单耳或立体动物，纹饰繁缛，以勾连纹、三角齿纹为主，刃两端基本上处于同一水平线。撇开青铜器之间的这种差异，与打制双肩石器相比，青铜器与石器之间的相似性却很明显。年代上昌宁出土的约在春秋至战国晚期，滇池区域的约在战国至西汉晚期，推测这种“靴形钺”也可能是受到云南西部打制双肩石器影响所致，有可能也经历了由西至东传播发展的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糅合本地特色而显示出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区域特征。

在云南出土有肩青铜器的地区中，昌宁<sup>[59]</sup>是一个较为重要的地区。昌宁出土的有肩青铜器，在类型上包括了剑川海门口的铜钺类型，年代也可能与剑川海门口接近；昌宁的有肩青铜器

基本上分布在昌宁与龙陵相接的北部地区,而在龙陵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打制双肩石器遗址,即船口坝和大花石,年代大体与剑川海门口接近。因此,可以说,昌宁出土的有肩青铜器是受打制双肩石器的影响而产生,且龙陵的打制双肩石器极有可能是昌宁出土的有肩青铜器的源头。

从以上分析来看,云南的有肩铜器与打制双肩石器有着较紧密的关系。其中与打制双肩石器A型、B式、C式、C形制相似的青铜器在商末即已出现;与打制双肩石器C式、D式、D式形制接近的青铜器出现年代稍晚,因为打制双肩石器C式、D式、D式形制的发展就较晚,正常情况下年代应比前述几型双肩石器年代稍晚,因此与这几式形制接近的青铜器出现年代较晚也是可以理解的。

综上所述,云南的青铜时代有肩铜器与云南的打制双肩石器有着诸多的渊源关系,许多青铜时代初期的器物造型与打制双肩石器的关系尤为紧密。众所周知,云南地处西南,民族众多,地理环境复杂,文化发展滞后并且不统一。在中原地区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的商周时期,云南大部分地区仍处于铜石并用时代,石器的使用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种情况下,铜器的造型在长时间里受到石器造型的影响,是完全可能的。

## 五、结语

云南打制双肩石器,是一个独特的考古学现象,但它不是无源无流的。它有可能是发源于云南西部磨制石器文化,尔后影响了云南青铜器造型,为云南本土独具魅力的青铜文化增添了一丝异彩。

注释:

[1] 王仁湘:《关于我国新石器时代双肩石器的几个问题》,《南方民族考古》1987年第一辑。

[2] 傅宪国:《论有段石锛和有肩石器》,《考古学报》1988年第1期。

[3] 张兴永、黄德荣、包秀芬:《云南怒江州发现的新石器》,《云南文物》第19期。

[4] 耿德铭、朱文仙、罗睿、李蕙兰:《保山坝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保山史前考古》,云南科技出版社,1992年1月;朱文仙:《保山市发现忙怀型新石器》,《云南文物》第49期。

[5] 保山地区文物管理所、龙陵县文物管理所:《云南龙陵怒江流域新石器遗址调查》,《考古》1991年第6期;龙陵县文管所:《云南龙陵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92年第4期。

[6] 杨升义:《施甸半坡牛汪塘新石器遗址调查报告》,《云南文物》第33期;耿德铭:《施甸新发现八处石器文化遗址》,《云南文物》第23期;保山地区文管所、施甸县文管所:《云南施甸火星山石器遗址调查报告》,《云南文物》第22期。

[7] 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云县忙怀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77年第3期;戴宗品:《云南云县曼干遗址的发掘》,《考古》2004年第8期。

[8] 李枝彩、张绍全:《德斯里新石器遗址》,《保山史前考古》,云南科技出版社,1992年1月。

[9] 联合考古发掘队:《景东丙况遗址发掘简报》,《云南文物》第55期;黄桂枢:《云南思茅四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93年第9期。

[10] 黄桂枢:《云南思茅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93年第9期。

[11] 黄桂枢:《云南思茅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93年第9期。

[12] 周剑平:《澜沧江文物考古调查—临沧段暨第一阶段成果》,《云南文物》2003年第1期。

[13] 黄桂枢:《云南思茅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93年第9期。

[14] 黄桂枢:《云南思茅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93年第9期。

[15] 保山地区文物管理所、龙陵县文物管理所:《云南龙陵怒江流域新石器遗址调查》,《考古》1991年第6期。

[16] 朱文仙:《保山市发现忙怀型新石器》,《云南文物》第49期。

[17] 朱文仙:《保山市发现忙怀型新石器》,《云南文物》第49期。

[18] 黄桂枢:《云南思茅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93年第9期。

[19] 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云县忙怀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77年第3期。

[20] 保山地区文物管理所、龙陵县文物管理所:《云南龙陵怒江流域新石器遗址调查》,《考古》1991年第6期;龙陵县文管所:《云南龙陵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92年第4期。

[21] 联合考古发掘队:《景东丙况遗址发掘简报》,《云南文物》第55期。

[22] 戴宗品:《云南云县曼干遗址的发掘》,《考古》2004年第8期。

[23] 转引自王大道:《再论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云南考古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10月。

[24] 转引自王大道:《再论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云南考古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10月。

[25] 保山地区文物管理所、龙陵县文物管理所:《云南龙陵怒江流域新石器遗址调查》,《考古》1991年第6期。



[26] 李枝彩、张绍全：《德斯里新石器遗址》，《保山史前考古》，云南科技出版社，1992年1月。

[27] 杨升义：《施甸半坡牛汪塘新石器遗址调查报告》，《云南文物》第33期。

[28] 黄桂枢：《云南思茅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93年第9期。

[29] 耿德铭、张绍全：《云南昌宁青铜器综说》，《考古》1992年第5期。

[30] 黄桂枢：《云南思茅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93年第9期。

[31] 肖明华：《剑川海门口青铜时代早期遗址》，《云南文物》第41期。

[32] 王大道：《再论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云南考古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10月。

[33] 王大道：《昌宁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年鉴》（1991年），文物出版社1992年8月。

[34] 耿德铭、乐琪、杨升义：《施甸县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保山史前考古》，云南科技出版社，1992年1月。

[35] 耿德铭、朱文仙、罗睿、李蕙兰：《保山坝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保山史前考古》，云南科技出版社，1992年1月。

[36] 转引自王大道：《再论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云南考古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10月。

[37] 转引自王大道：《再论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云南考古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10月。

[38]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理州文物管理所、永平县文物管理所：《云南永平新光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2年第2期。

[39]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40]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云南工作队、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楚雄州博物馆、永仁县文化馆：《云南永仁菜园子、磨盘地遗址2001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3年第2期。

[41]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云南工作队、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楚雄州博物馆、永仁县文化馆：《云南永仁菜园子、磨盘地遗址2001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3年第2期。

[42]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理州文物管理所、永平县文物管理所：《云南永平新光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2年第2期。

[4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五）》，《考古》1978年第4期；王大道：《再论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云南考古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10月。

[4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2年。

[45]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云南工作队、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楚雄州博物馆、永仁县文化馆：《云南永仁菜园子、磨盘地遗址2001年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2003年第2期。

[4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2年。

[47] 云南省博物馆筹备处：《剑川海门口古文化遗址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6期。

[48] 肖明华：《剑川海门口青铜时代早期遗址》，《云南文物》第41期。

[49] 肖明华：《剑川海门口1978年发掘所获铜器及其有关问题》，《云南青铜文化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

[50] 耿德铭、张绍全：《云南昌宁青铜器综说》，《考古》1992年第5期。

[51]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楚雄万家坝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

[52] 谢道辛、王涵：《云龙县首次发现青铜器》，《云南文物》第11期。

[53] 转引自王大道：《云南青铜文化与新石器晚期文化的关系》，《云南考古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10月。

[54]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55] 云南省博物馆：《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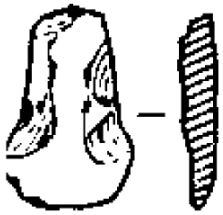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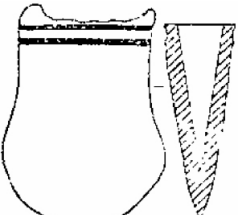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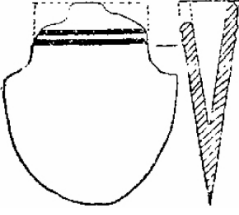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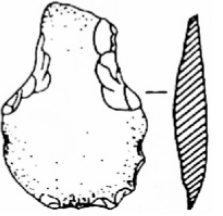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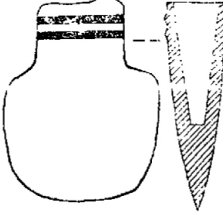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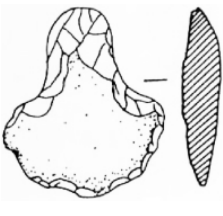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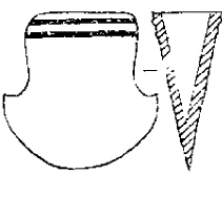
[56] 昆明市文管会：《呈贡天子庙滇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

[57]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元江洼控打蒿陡青铜时代墓地》，《文物》1992年第7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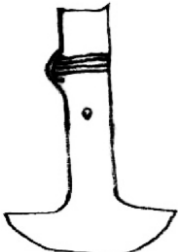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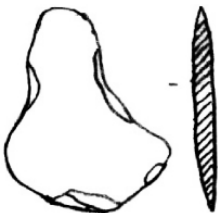


[58] 云南省博物馆、昌宁县文化馆：《近年来云南昌宁出土的青铜器》，《考古》1990年第3期；耿德铭、张绍全：《云南昌宁青铜器综说》，《考古》1992年第5期。

[59] 云南省博物馆、昌宁县文化馆：《近年来云南昌宁出土的青铜器》，《考古》1990年第3期；耿德铭、张绍全：《云南昌宁青铜器综说》，《考古》1992年第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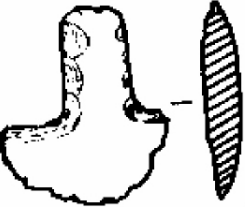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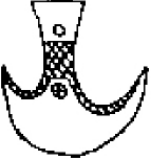


附表 打制双肩石器与青铜器之比较

云南打制双肩石器及类型	剑川海门口出土铜器
 1. A 型	 5
 2. B 式	 6
 3. C 式	 7
 4. C 式	 8

1. 龙陵船口坝；2. 龙陵船口坝；3. 云县曼干；4. 云县曼干；  
5. 剑海 227 号；6. 剑海 T1：4-74；7. 剑海 228；8. 剑海 226

云南打制双肩石器及类型	云南楚雄万家坝出土铜钺
 <p>9. C 式</p>	 <p>10</p>
云南打制双肩石器及类型	云南元江洼挂打篙陡出土铜钺
 <p>11. D 式</p>	 <p>12</p>  <p>13</p>

9. 龙陵船口坝；10. 楚雄万家坝；11. 景东丙况；12-13. 元江洼洼打篙陡

云南打制双肩石器及类型	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铜钺
 14. D 式	 15
 16. D 式	 17
 18. D 式	 19

14. 龙陵大花石；15. 江川李家山；16. 龙陵船口坝；17. 昌宁营盘山；18. 龙陵船口坝；19. 晋宁石寨山